張季鸞與《大公報》

段懷清

如果我們將抗戰前後、包括抗戰期間一些報紙的社論時評文章拿來，做一個主張上的比對，看一看那些言論在抗戰前怎樣，抗戰中又有怎樣的改變，抗戰結束之後又是如何，或許會有一些發現和感慨。

我偶然購得《季鸞文存》第二冊的時候，恰逢正在讀上海抗戰爆發前後胡蘭成主持的《中華日報》上的輿論，以及四十年代初他離開《中華日報》，主持《國民新聞》的社論與時評。將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上所刊發的抗戰愛國言論，與胡蘭成在抗戰當中先抗戰愛國、後「賣國求榮」式的變節言論拿在一起對讀，實在讓人感慨不已。

譬如，說到救國與勤勉地工作，說到愛國從我做起，從個人做起，張季鸞的言論不可說不「進步」——他甚至連那些組織公演舊戲的學生劇團，也實在看不慣，提出批評說：

> 今日何時——卻有工夫迷信這些無益之事。哼幾句戲，隨便消遣，尚屬無妨；認眞的上台演唱，要費多少腦力與光陰？受高級教育的青年，在今天，還有閒心迷信這些事。要講藝術，應該創造些比職業的舊戲家更藝術的玩意，犧牲嚴重光陰，模仿他們做甚。這種事實本身，可說是一種悲劇了！

將抗戰之前青年們在舞台上表演傳統舊戲，看成是一種與時代無益的行爲，甚至是一種時代悲劇！張季鸞的這種認識和觀點，不可說不激烈，不可說不急切！這不禁讓人想起抗戰爆發之後，在全國文藝界，尤其是國統區文藝界當中所爆發的「抗戰文藝」論。與抗戰無關的文藝，尤其是那種傳統文人修心養性、談天說地一類的文字，在這種思維中，恐怕也屬於與抗戰無關亦無益的文字，平時尚可，此時無益；偶爾尚可，倡導無益。這大概也是抗戰中某些文藝觀不爲時局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抗戰大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戰。

很難說張季鸞就是在宣揚一種抗戰文藝，但是他的上述言論，卻至少顯示出兩點信息，一是對於傳統舊戲，張季鸞並沒有所謂現代文化保守主義者那樣的傳統情結，並非是一個現代的抱殘守缺者，相反，他對某些傳統藝術形式的現實意義，倒有着極爲清醒的認識把握；二是他將文藝與青年、文藝與社會、文藝與現實乃至文藝與民族國家的未來之關係，看得極重。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娛樂已經無暇，更何況是一種不良的娛樂！「願全國青年們想想：在這嚴重國難之下，受這點教育，時機如何寶貴，意義怎樣莊嚴？常這樣想着，就是知恥之道了！」

其實，沒有讀過二十到四十年代《大公報》社論的青年，尤其是今天的青年讀者，包括沒有讀過張季鸞的文字的人，以爲這一在當時具有影響力的大報和大報的總主筆，定然不會想到，這份報紙、這一主筆，當年還如此熱血沸騰！在《九一八紀念日論抗戰前途》（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大公報》）中，張季鸞有這樣一句話「今年今日，卻已展開了壯烈的血戰，以清算六年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恥辱」。

抗戰前後，國內政界知識界有所謂高調抗戰論，亦有所謂「低調俱樂部」。前者抗戰爆發之後，倒確實成爲抗戰抵抗之中堅力量，而後者，那些所謂理想冷靜思考抗戰前途以及國家民族前途的人，大多卻成了落水附逆的急先鋒。其實，當初的「低調俱樂部」中，亦不乏高調抗戰論者，不過這種高調，並非是一種認眞的態度，不過是爲了個人贏得某些實際的利益而已。這跟張季鸞多年來一貫的愛國力量、抗戰立場和堅信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只有通過這樣一場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侵略戰爭，才有可能獲得眞正意義上的民族覺悟與解放的思想主張之間，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在這篇鼓動民衆堅持信心、積極抗戰的文章中，張季鸞已經鮮明地提出「中國能持久必能勝利」的觀點。而在隨後若干篇社論中，張季鸞所鼓動的，依然是全社會的總動員、全民族的總抗戰，一切爲了抗戰的思想，固然與當時最高當局的抗戰政策一致，但在張季鸞這裡，卻是與他抗戰全面爆發前若干年就已經表達過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思想一脈相承。

這種思想，是一個眞正的愛國者的思想，是一個眞正對現代中國抱有期待與理想的言論者的思想，也是一個現代報人，借助於報端輿論，來影響大衆、影響社會，以圖實現民衆覺悟、社會覺悟和社會民族進步者的理想。

這種言論，跟《中華日報》三七、三八年時期的高調抗戰，復刊後的「投降言論」相比，實在是有天壤之別。且不說愛國不愛國，單就現代那些機械的進化論者所堅持的觀點——凡老者就一定反動，凡青年就一定新潮進步——之間，也實在有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原由，亦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即便是今天。

（四之四，全文完）

「紅顏」裡的神童

馬佳

中國歷史上不乏「紅顏」才女，其中有不少自幼成名的「神童」。在塡詞賦詩是衡量個人才學和智慧重要尺碼的古代，女神童大多生不逢時，過早地被森嚴的宮幃或滾滾紅塵吞噬了青春甚至生命，但她們小小年紀寫的詩作，卻不乏神韻，至今仍閃爍着人性的光輝。

被唐明皇李隆基封爲「梅妃」的絕代佳人江采萍，就是位女神童。江采萍是福建一位名醫之女，自幼能歌善舞，五六歲會寫詩文。十二歲時她被出使閩粵的宦官發現，帶回宮中。這位骨秀貌清的小才女「驚艷」得李隆基相見恨晚，立即納爲妃子。因江采萍酷愛梅花，便賜名「梅妃」。可惜好景不長，風流的唐玄宗又看上兒媳楊玉環，從此梅妃便風光不再。一次玄宗派人給身處「冷宮」的梅妃送珠寶，采萍斷然拒絕，還題《謝賜珍珠》一詩傾吐不滿：「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玄宗閱後心生愧意，想召幸梅妃，但因霸道的楊玉環作梗而罷休。安史之亂時，梅妃慘死於亂刀之下；也有人說她是看破塵世投井自盡了，堪稱紅顏多薄命！

天賦甚高的武則天對才女也「惺惺相惜」，某次有人找了個會寫詩的七齡女童，女皇下令召見，女孩由阿哥陪着來到長安。一見這丫頭果然聰明伶俐乖巧可愛，武則天想把她留下，讓男孩先回去。女孩含淚吟了首送別詩：「別路雲初起，涼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難作一行歸。」女皇被這淒楚詩句打動，更喜歡她了。無奈兄妹難捨難分，武則天也無可奈何，只好放他倆回去了。唐武宗時有一名女神童叫魚玄機，原名魚幼薇，出身長安一士人之家。其父到老不得功名，便將心血傾注在獨生女幼薇身上。小女孩天資聰慧，五歲讀書過目不忘，七歲能寫詩，十一二歲寫的詩就頗受好評，還驚動大詩人溫庭筠前來看她。幼薇當場賦詩道：「翠色連荒岸，煙姿入遠樓；影鋪春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底繫客舟；蕭蕭風雨夜，驚夢復添愁。」溫庭筠連聲稱讚，兩人從此結成忘年交。可惜，魚幼薇後因感情失敗心灰意冷，出家當了尼姑，改名魚玄機；後又因一樁命案被處斬刑，年僅二十五歲！

與魚玄機同期還有一位著名的「美女詩人」薛濤。薛濤也是長安人，安史之亂後其父入蜀，她就生於蜀道之上。薛濤自幼天賦極高，八歲時作有《梧桐詩》：「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備受父老讚頌。十四歲時其父早逝，爲求生計，薛濤當了一名詩樂娛客的詩妓，因超群之貌和絕世之才而聲名遠播。後得到當地節度使韋皐賞識，出任「女校書」。不久因故遭貶松州，寫下十首著名的離別詩。但韋皐還算不錯，經濟上給予資助，使衣食無憂的薛濤得以潛心詩詞翰墨，她用胭脂特製的信箋非常有名，被譽爲「薛濤箋」。薛濤活到七十三歲，在一衆紅顏才女中絕對算是高壽了！

容貌蓋世的南齊名妓蘇小小，十幾歲便作詞自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於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傳誦一時，名揚江南。蘇小小重感情，曾寫《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泠松柏下」，道出與心中「白馬王子」的生死之戀。或許自知紅顏命薄，這位「美眉」早早立下「生死在西泠，不負好山水」的遺願。果然不幸被言中，十九歲時她便咯血而死，葬在西泠之塢。後世文人對其無不惋惜，李賀、白居易等大詩人都寫詩追念她。

以一闋《胡笳十八拍》千古流芳的東漢才女蔡琰——即鼎鼎大名的蔡文姬，從小精通音律詩文。六歲時某日深夜，她被一陣琴聲吵醒，原來是父親蔡邕在書房寫作勞累了，操琴以減輕疲倦。忽聞「崩」的一聲，小文姬便對老爸大喊：「我猜您弄斷了第二根弦，對否？」蔡邕一驚，問：「你再聽這是哪一根？」隨即又故意撥斷一根，文姬喊道：「這回是第四根！」父親大喜，問她何以猜出？文姬道：「何須猜呀，七根弦哪一根我都能聽出來！」在父親精心培育下，蔡琰終成七弦琴高手和文壇女傑。可憐這位如花似玉的小才女「命運不濟」，長大時恰逢匈奴入侵，不幸被掠到北地，後經曹操救回，但國恨家仇和悲劇婚姻，帶給她無限哀怨，這些不幸全部融入她催人淚下的《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裡了。

蘇軾邀我到惠州

黃東成

夜半，蘇軾入夢來，邀我作客惠州。說，我被貶黃州，你尋蹤訪了黃州，我謫居惠州，也該來惠州一訪才是。醒來，半晌方悟，也許因白天剛接到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邀函。第十二屆筆會即將在蘇軾再次落難的南粵惠州舉辦，故有此夢。

前些年緣蘇軾的《赤壁賦》我曾去湖北黃州採訪，寫了《人道是黃州東坡赤壁》一文。這次蘇軾邀我作客惠州，一定是希望我再寫點什麼。

惠州距廣州兩小時車程。筆會會址在城中惠州賓館，計有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詩人應邀出席。賓館傍着惠州西湖，車到時正值夕陽西下，巨大的鵝蛋黃將湖水漾出一條玫瑰色通道，景色美極了。朝廷原以爲惠州是南粵蠻荒之地，旨在整飭蘇軾，卻不料惠州有山有水風景獨特，成了蘇軾休養生息的好去處。雖說是被貶，卻還給了個「寧遠軍節度副使」的虛銜，使他有機會將杭州模式搬到惠州。

惠州也有個西湖，也有蘇堤，想當然皆緣於蘇軾得名。惠州西湖原名豐湖，由豐湖、菱湖、鱷湖、平湖、南湖五處和許多不知名的小湖組成，實際水面比杭州西湖大了二倍，面積爲一百萬平方尺，而西湖則爲四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九平方尺。但因被許多景點分割，視覺上似乎要比杭州西湖小。因湖在惠州府城之西，流寓惠州剛三個月的蘇軾，與當地友人「飲之且醉」時，寫下了「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詩，首次將豐湖稱作西湖，西湖之名由此叫開。清代惠州詩人題西湖集句有云：「北客幾人謫南粵，東坡到處有西湖。」

當晚，惠州市政府爲詩人們接風宴後，東道主即陪同代表們至南國西湖觀賞夜景。只見湖兩岸七彩霓虹燈組成的各種圖案，映在光影閃爍的湖面，更兼遠山頂上的玉塔將彩色探照燈光束向湖上掃射，別是一番美麗景觀。湖心長堤邊，立滿刻着蘇軾詩句的石碑。爲表示對詩會的祝賀，市政府特地爲詩人們準備了一個有意義的節目：「放生」。原來湖邊臨岸早準備了許多小桶，桶裡盛着一尾尾游動的魚苗，所謂放生，就是讓詩人們將一桶桶魚苗倒進湖裡。準確地說，這其實應該叫放養。放生則爲佛家偈語，將捕獲的野生動物重新放歸自然，以示佛家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第二天筆會開幕式後，下午便正式組織遊覽南國西湖。沿着正門進去有一條寬闊的長堤，那便是蘇堤。北宋時這裡原有「長橋」，因屢作屢壞，湖兩岸來往非常不便，蘇軾謫居惠州以後，關愛百姓之心依舊，倡議在此築堤建橋，得到地方官的首肯，爲籌集資金，他帶頭將自己的「犀帶」捐了出來，還動員親屬捐金數千。堤橋竣工後，他還與百姓在湖邊的西村（今惠州賓館）共慶狂歡。後人爲紀念蘇軾在惠勝績，遂名此堤爲蘇公堤，俗稱蘇堤。

惠州西湖有八大勝景：豐湖漁唱、半徑樵歸、山寺嵐煙、水簾飛瀑、荔浦風清、桃園日暖、鶴峰返照、雁塔斜暉，堪與杭州西湖十景媲美。走進蘇堤，不論是佇足於蘇公橋還是湖心九曲橋上，或者遊覽在點翠洲還是芳華洲頭，目不暇接的四個字：美不勝收。恰如明代惠州知府、生於錢塘江畔的杭州人顧言所形容的：漱玉流丹、棲雲遊羽、如拱如躍、欲去欲止、呈凝宇宙、變化萬狀。是謂「颯颯而飄矜者，風也；零零而侵體者，露也；輝輝而寒芒者，星也：澄澄瑟瑟而如練如黛者，水與山也；寄託於一葦，遐舉於身世，逍遙於太虛，憑凌於往哲，翩翩翼翼，渺渺浩浩……」這確是一個從小足跡踏遍杭州西湖的客地官員，置身於惠州西湖星、露、風、葦之中的眞感覺。

有人將惠州西湖與杭州西湖進行了一番比照：杭州西湖地處鬧市，惠州西湖位於城中；杭州西湖旁有孤山，惠州西湖也有孤山；杭州西湖建有蘇堤，惠州西湖也築有蘇堤；杭州西湖有雷峰塔，惠州西湖有泗州塔；杭州西湖有蘇小小；惠州西湖有王朝雲；杭州西湖傍錢塘近東海，惠州西湖近東江而靠南海；杭州西湖因蘇東坡而名播天下，惠州西湖因蘇東坡而流芳青史……兩個西湖相近之處實在太多，非常之多。

當然有不同點。最大的不同便是惠州西湖的南國特色。湖的周邊遍種紅艷逼空的木棉，俗稱「英雄樹」。每當春時，萬花怒放，蒼古奇麗，如火如血，似流紅逐水，若火雲四合。漫步湖畔，彷彿遍地英雄嘯歌於血火之中，讓人不由心中詩情燃燒。紅，惠州西湖無須裝扮的天然底色。難怪清代詩人吳騫在《西湖紀勝》一詩中如此寫道：「西湖西子比相當，濃抹杭州惠淡妝。惠是苧蘿村裡質，杭教歌舞媚君王。」喻杭州西湖天生麗質，雍容華貴，惠州西湖則村婦素面，淡雅可心。「顧美莫過於天然」，一個淡字，盡顯獨特神韻。

惠州有如此美麗自然的山水景物，這是大大出於北宋宮廷意料的。加之當時惠州的地方官對大詩人蘇軾照顧有加，這就使打擊迫害必欲置蘇軾於死地的政敵們心裡不舒服了，怎麼能容忍這個謫貶的罪人生活在好山好水好吃好喝的環境裡，過得那麼舒適快活。於是利用執掌的權力，責令蘇東坡調任「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又將他從惠州發配到天涯海角眞正蠻荒的儋州（即海南島）去了。

惠州西湖（資料圖片）

露天電影懷舊風吹

蕭愚

數十年前曾風行神州的「露天電影」近來再度復蘇，城鄉各地不時有露天電影免費放映，但今時不同往昔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電影情節還在其次，人們觀賞露天電影心態主要是懷舊。

三十歲以上的內地人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露天電影」風盛的老時光：每到放映的夜晚，老老少少搬着櫈子椅子，早早趕至用足球場、籃球場等戶外空地臨時開設的電影場，放映員在露天空地中，用兩根杆子撐起一塊白色的銀幕，放映機將膠片影像投射在銀幕上……星空下，納着清風，看着露天電影，熱鬧的人群度過難忘的夜晚。看露天電影，成了當年國人娛樂的重要方式和精神寄託。

提起看「露天電影」，今年五十歲的影迷譚某說，他最喜歡在足球場上看「露天電影」，在月夜裡在星空下呼吸着球場青草的芳香看電影最寫意。今年四十歲的陳某則說，她的父親母親和爺爺奶奶都喜歡看「露天電影」，七八十年代，他們家居住的學院每個周六晚上放電影，放電影的日子，母親傍晚就催促她和哥哥爲爺爺奶奶「擔櫈仔霸頭位」，去遲了就不能佔到正對銀幕中間的位置了，再遲些只好坐到銀幕反面，看到電影裡的人全是用左手拿筆操刀的「左撇子」。今年三十歲的張某說，他和小夥伴當年都愛看「露天電影」，尤其喜歡在電影開映前在亮着光放映機前做各種動作，讓手影投射到銀幕上……

九十年代以後，隨着電視機、影碟機和電腦等普及家庭，以及電影院設施越來越先進，「露天電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但是，看膩了室內空調房的影像後，人們又再度懷念起免費的「露天電影」。於是，「露天電影」順遂民意應運回潮。

近來，神州各地城鄉政府部門、團體、企業和商家紛紛放映「露天電影」免費給民衆觀看，上海政府有關部門近五年來年年暑假舉辦免費露天電影進公園活動，在全市數十座公園綠地放映了逾六百場電影，吸引了超過一百三十多萬市民遊客觀看。今年七月高清晰度的數字電影進入瀋陽市的社區廣場露天播放，當地某電影公司僅今年七月就在瀋陽十個社區一百多個文化廣場免費爲市民放映了二百多場數字電影。最近廣東某食品集團冠名贊助的「電影進社區」活動在廣州二十六個社區舉辦，讓街坊享受露天電影樂趣之時，也宣傳了自己的品牌。天津有酒店每天放映露天電影，讓食客餐飲娛樂兩不誤。

不過，如今國人看「露天電影」遠遠不及當年「狂熱」，觀看者多抱着「懷舊」、「好奇」、「納涼順便看看」、「路過順便看看」的心情觀賞露天電影。不少人說，免費放映的露天電影多數是老電影和一些不知名的電影，若要看新片，還是要到電影院或買影碟看。但也有退休老年影迷說，電影院數十元一張電影票，票價太高看不起，免費露天電影有一些經典老片還是值得一看再看的。

加國庸酬風

姚船

也許預計在今秋極可能舉行的聯邦大選中敗北，失去最高權力，加拿大總理哈珀近來大開水喉「放水」，可惜得益的並非平民百姓，而是「自己友」。他八月底一口氣任命了九名聯邦參議員，其中多數是其保守黨顯赫人物，包括競選主席，保守黨總裁，他自己長期新聞秘書等，以及落選的保守黨候選人和積極支持該黨的人。此舉引起輿論極大反彈。

加拿大國會分參、衆兩院。衆議院議員由民選產生，而參議院議員則由總理任命。衆議院辯論通過的法案，要由參議院通過才能成爲法律。雖然參議院實際只是「橡皮圖章」，但參議員名重薪高，年入十三萬二千加幣，還有優厚福利、津貼，一年可報銷六十四次國內機票。每年工作七十天，直至七十五歲才退休，一貫被視爲肥缺，難怪參議院被一些人戲稱爲「安置政治密友傾卸場」。參議院中不乏眞正對社會有貢獻且受民衆愛戴的參議員，但由於經常被「滲水」，令其在國民心目中威望大受影響。

平心而論，政治庸酬並非哈珀所創。翻開近些年加國歷史，幾乎每屆總理都「臨別送秋波」，兩黨均沒例外，這已經成爲一股風氣。除了任命參議員，成千上百個公營機構、政府轄下各類名目委員會主管職位，也在酬庸之列。

保守黨前總理梅隆尼，自由黨前總理克雷蒂安，下台前的酬庸名單洋洋上百人。慷公家之慨來還人情債，並由此織成一張不平常的私人網絡，對民衆和那些有才能而不被重用的人是極不公平的。總理每每聲言有法可依，沒錯，但一個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在做出任何一個決定之前，是考慮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還是一己之私？

庸酬風被廣大民衆批評，包括在野黨厲聲譴責，但多少年來卻一路如是，要刹住這股歪風談何容易。記得二〇〇六年大選時，哈珀誓言一旦當選，將改革參議院，參議員民主產生，「杜絕一切政治酬庸」。如今言猶在耳，就已私相授受，除了多名參議員，還有幾十個政府屬下委員會的「優差」。而喊了兩年多要成立的「公職任命委員會」，至今除了花去納稅人三百多萬加幣以外，八字還沒一撇。難怪反對黨指哈珀所作所爲「摑了加拿大人一記耳光」。

有人形容，政客似魔術師，手法高明，令人眼花繚亂，分不清眞假。民衆投下手中選票，選出來的人上台後往往又變成另一個人，眞令人氣餒。等到下次大選，選民經不起政客三寸不爛之舌的鼓動，又再善忘受騙上當。

周而復始，民主社會就這樣不停表演着一套政治把戲。主角當然是政治人物，社會大衆在「舞台」上永遠是名副其實的「群衆角色」。

並不久遠的往事

言止善

有些對於我恍如昨日的事，我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兒至多知道一點點。

我上中學時，全民大鬧煉鋼鐵。我們學校部分同學參加煉鋼鐵和煉水泥，我們班的任務是燒紅磚。帶我們勞動的老師向我們作動員：「燒紅磚，顧名思義，又紅又專嘛。」這位「顧名思義」老師，果然名不虛傳，五一國際勞動節，他也要求我們勞動——「因爲勞動節，顧名思義，應當勞動嘛。」——我的同學卻在下面小聲議論：「後面還有一個『節』字呀！」

過後，就是挨餓的日子。主要是油水太少，肚子脹了，還想吃。人坐在教室裡，心老惦記食堂。我參加工作後，有一位同事，五短身材。他是一九六〇年出生的，他告訴我，他家那個生產隊，有五個同齡的嬰兒，倖存的，只有他一個。

一九六二年以後，基本不挨餓了。在一九六六年，又開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天安門城樓上多了一位林副主席。他一臉病容，但常常出語驚人。他告訴我們「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萬句。」聽他的話，我們無限熱愛毛主席，也十分崇敬他。我們每天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也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那時，我在大學讀書，我的一位敏感而懵懂的同學貼出一張大字報，說林副主席不能當接班人，他立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了監獄。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副主席叛逃，他坐的是「三叉戟」飛機，飛機墜落在蒙古的沙漠裡，這樣，成語「折戟沉沙」又有了新的意義。

從讀書到參加工作，我塡寫過不少履歷表。表格裡一定有「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兩個欄目。那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統稱「黑五類」，你和「黑五類」有了瓜葛，你的升學、就職、提幹等就要受到限制。最難講清的是「海外關係」，如果你有個親戚在美國，那可不是好事情。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成績不錯，考了幾次大學，都沒有被錄取。撥亂反正之後，才知道原因在於他的父親是一個「內定右派」。

一九七七年，全國恢復了中斷十一年的高考，考進來的學生，有的只有十七八歲，有的已經三十出頭。那些學生都很用功，他們要「把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當時，街上的外國人很少，有些學英語的學生他們會跟在外國人的後面，目的是想聽聽人家的發音。一九七八年，上海復旦大學有個叫盧新華的學生，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爲《傷痕》的小說，控訴「血統論」給人的心靈傷害，此後，出了一批作品，它們被稱爲「傷痕文學」。

一九八〇年，我們家添置了第一樣重要家電，那是一台十二英寸的電扇，花了一百零五元，超過我們夫妻倆一個月工資之和。從此，即使在炎炎的夏日，「現代化」的涼風也能吹進了我們四口之家居住的那間十多平米的小屋，全家人都認爲是一種享受。以後的故事，女兒自己也能講出一些來了。

蘇軾說「人生須臾」，他那是用神仙的口氣講話。過去幾十年，我卻已經經歷了兩種反差極大的生活。我的外孫女出世，她受到的「待遇」與我女兒在嬰兒期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語：她吃的是配方奶粉，穿的是紙尿褲。開始，老伴和我都對這種「洋褲子」的功能質疑，女兒說：「人家美國小孩子都穿這種褲子，不是沒出問題麼？」我倆無言以對。